

风险传播图景中的童年： 儿童影像的建构、再现政治与传播伦理

周敏 王阳 何谦

摘要

风险不单纯指对客观世界的描述,更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媒介描绘的风险图景成为大众最直接的感知来源,是显著的风险放大站。在风险传播的视觉化表征中,儿童影像成为定义与描绘风险的重要符号。本文从媒体“放大”的视角来关注儿童影像在风险传播中的特殊效应。儿童影像在风险放大的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传播效力:担任风险的文化之眼,激发大众情感共鸣,强化批评场域,并沉淀为风险记忆。此外,儿童影像通过具象化风险,争夺话语权,展现政治立场与道德关怀的方式,表现出其在风险放大中的影响力。但是大众媒体在运用儿童影像放大风险的过程中,仍存有绑架儿童做风险代理人、娱乐化情感消费以及违背新闻伦理等一系列问题。聚焦国内风险图景,儿童影像的风险放大效果并未被清晰认知,审视儿童影像的特殊传播效果,把握适当的风险放大尺度成为媒体不可忽视的问题。

关键词

风险传播、儿童影像、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大众媒介

作者简介

周敏,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电邮:zhoumin01@bnu.edu.cn。

王阳,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电邮:1940689735@qq.com。

何谦,美国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电影与媒体系博士生。电邮:qianh@uw.edu。

Childhood through the Lens of Risk Communication: Social Construction,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and Journalism Ethics of Child Image

ZHOU Min, WANG Yang, HE Qian

Abstract

socially constructed product.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the risk have become the most obvious site where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takes place. On the visual and representative level of risk communication, child image has become a key symbol to define and elaborate the risk. From a perspective upon media's "amplification", this essay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specific effects that the child image has over the course of risk communication. To put it differently, this essay explores how the child image performs as a cultural eye on the risk, arouses the public emotional resonance, consolidates the field of public criticism and shapes collective memory. Moreover, a wide range of images of children have engag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risk society through embodying the risk, holding the discourse power and indicating political standpoints and moral concerns. However, a number of problems still lie in mass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children including the overuse of children as risk proxies, exploitations of children's sentimental values, violations of journalism ethics and so forth. Focusing on the risk landscape in China, this essay suggests that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that the child image has brought about has not been clearly recognized and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Besides,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child image's social function and the measurement of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should be necessary for any newsroom.

Keywords

risk communication, child image, SARF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framework), mass media

Authors

Zhou Min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zhoumin01@bnu.edu.cn.

Wang Yang is a Master Degree Candidat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1940689735@qq.com.

He Qian is a PhD student in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inema & Med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Email: qianh@uw.edu.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当下社会显然成为了一个风险社会。大众媒介是人们感知风险社会的主要途径,在建构风险的过程中充当了风险社会放大站。同时,“景观社会”的来临让图像的表现力与日俱增,世界的图像化深刻改变了人的存在,上升到视觉层面关系的体验加剧着大众的风险感知。双重作用下,媒介中的儿童影像被充分利用。由于儿童形象能够折射出所属时代的文化传统及社会问题,大众媒体借助影像表征与报道方式,使儿童影像成为风险放大效应中的助推力,将风险社会进一步呈现在大众面前。

一、文献综述

1986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并将风险传播引入到传播领域,提出风险是一种认知图谱,是一种“人为不确定性”,代表了一种潜在的社会威胁与灾难(乌尔里希·贝克,2004:188)。随着对风险问题研究的扩展,风险发展模式出现了明显的分离趋势。在整合和吸纳不同方法和理论之后,1988年以克拉克大学教授为主的八位学者共同发表了论文《风险的社会放大:一个概念框架》(Kasperson et al., 1988),创立了“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SARF),提出风险放大是指信息过程、制度结构、社会团体行为和个体反应共同塑造风险的社会体验,从而促成风险结果放大的现象,此框架为风险传播效果以及一系列范围更广泛的研究提供了解释。

伴随着“风险社会放大框架”(SARF)的提出,国外相关研究随之兴起,分为几大不同的研究路径:

一是对框架概念的研究:《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的逻辑结构:超理论基础与政策含义》(Rosa, 2003)对该框架所指涉的风险进行了本体论与认识论上的重新定义,并用等级制认识论来寻求二者的平衡点,阐明“风险”概念存在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风险的社会放大与分层理论》(Breakwell & Barnett, 2003)一文引入了“分层方法”,用于鉴别技术风险事件放大过程中不同变量因素之间的关系,从而最终为框架的预测能力提供帮助。

二是对公众认知下风险争议的研究:马克·普马德雷和克莱尔·梅斯对发生对法国汝拉山区的穆瓦朗小镇的神秘起火案进行实地调研,发表了《真实情景下的风险放大与弱化动力学》,文章提出风险讨论过程本身就是让技术风险事件被社会化放大的关键性动态因素,公众为降低风险采取的行为很可能导致技术风险的放大。

三是关于风险放大的次级效应与政策研究。《寻求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的公共政策意义》(Leiss, 2003)一文中指出应使框架能够帮助政府等技术风险的管理机构更好地履行其职责,并将管理机构看作是寻找技术风险放大来源的理想平台,同时在这个研究路径上,还有涉及信任的研究,指出了在风险的管理中信任起到的重要作用。

四是关于风险信号与大众传媒的研究:《媒介风险社会:风险放大与媒体的暴力战争》(Hill, 2001)一文中指出媒体的传播战争会直接影响到政治立法与道德恐慌,不同的组织影响着媒介中的信息流动,最终促成风险的放大效果;《瘟疫与砒:大众传媒批评指向及风险的社会放大与弱化》(Susarla, 2003)提出了大众传媒

的导向性直接影响了风险的传播效果,表明大众传媒是主要的风险放大站。

通过对研究现状进行梳理,笔者发现,国外对风险放大框架的研究相对完善,涉及领域广泛。在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的研究中,国外学者更多研究“风险放大”的概念与传播效果,也关注到媒体的风险放大站作用,但对更细致的儿童影像的风险放大作用尚未予以足够关注。而国外学者对于儿童影像的单独研究较为成熟,其研究对象可从修辞策略的角度被分为两大类:“关于儿童的影像”与“儿童视角的影像”。前者指的是儿童直接在影像中出现,以视觉形式呈现儿童形象、生活、行为与其他相关内容。后者中则不一定会直接出现儿童形象,相反,影像所呈现的内容是通过儿童的视角所看到、感知或体验到的成人所掌控的现实世界。从研究领域来看,这一序列的现有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方向:

一为研究儿童影像与童年建构的关系,如《纯真的图像:理想童年的历史与危机》(Higonnet, 1998)就阐述了始自维多利亚时期童年的建构史。《构图童年:流行图像中的儿童的神话》(Holland, 2004)一书中提出童年被成人建构成“冲突的空间”,儿童影像从而流动于成年社会的各种问题中。

二是探究儿童图像的社会功能,早在《小伙伴:美国童年图像史》(Brant & Cullman, 1980)中,两位学者就探讨了儿童图像形塑美国民族历史的过程。之后美国学者凯瑟琳·卡普肖在其著作《民权童年》(Capshaw, 2014)中也将焦点对向了儿童图像,发掘其调和舆论、阻碍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等社会功效。

三是研究大众传播中的儿童影像,即关注儿童影像在传播过程中具有的话题价值,探究媒体如何利用儿童影像来增强宣传效果,侧重研究媒体中儿童影像的利用对受众认知层面产生的影响。这些国外学者针对儿童影像的研究早已发掘出儿童影像特殊的社会功效与政治效用,也注意到了大众传媒对儿童影像的政治化或道德化利用,但将儿童影像与风险传播相结合的研究很少,关注其发挥的风险放大效应更是一大研究空白。

国内对风险放大框架的研究仍然较少,主要分为三大方面:

一是注重理论性分析,侧重于研究放大框架的发展历程。《风险缘何被放大?——国外“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与实证研究新进展》(伍麟,王磊,2013)对SARF近期的研究进展和不足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框架中存有的整体性描述和个体因素间难以协调的困境;《风险的社会放大:特征、危害及规避措施》(常硕峰,伍麟,2013)提出了风险传播中的危害,并建议政府保持信息公开,以品牌效应防止污名化,媒体应坚持客观公正,防止风险放大。

二是聚焦具体风险技术与风险案例的传播现状分析。《加强与衰减：风险的社会放大机制探析——以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为例》（张乐，童星，2008）探讨风险如何在传播中放大与弱化；《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机制——以转基因技术为例》（毛明芳，2010），提出技术风险事件如何在制度、文化和心理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下产生言过其实的传播效果。

三是对风险放大的原因进行分析。《技术风险VS感知风险：传播过程与风险社会放大》（曾繁旭，戴佳，王宇琦，2015）重点探讨了信息过程、制度结构和个体反应三重机制如何促成环境风险放大，分析中国语境下风险放大中的公众认知与舆论特征；《基于风险社会放大框架的大众媒介研究》（全燕，2013）则重点探讨大众传媒在风险放大过程中发挥的具体作用，这一研究点与本文的研究视角相契合。

总体观之，国内媒体对影像在风险传播中作用的研究并不深入，将儿童影像纳入风险传播的研究几乎没有。相较国外，国内关于儿童影像的研究也略单薄，多以研究图像、电影、广告等单个领域的儿童影像符号的话语分析为主。在为数不多的社会学视角下儿童影像的研究中，以陈映芳《图像中的孩子——社会学的分析》（陈映芳，2003）影响最大，其以儿童为主角的中外摄影作品、广告和宣传招贴画等视觉材料为研究对象，细致分析儿童的角色模型，及儿童在政治动员、社会批判和消费宣传中的形象和作用等图像社会学议题。儿童影像具有深刻的社会学价值，正逐渐成为风险传播中的重要组成要素，也是媒体实现风险放大效应的主要途径之一，把儿童影像与风险传播相结合是一个新的探索方向，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与深远的社会意义。

二、儿童影像的风险放大效果

（一）风险之眼的聚焦力量

风险事件总是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处于风险场域中的公众，因其信息、经验、知识的片段与支离破碎，容易对风险缺乏准确完整的认知。很多时候媒体需要借助一些符号将风险挖掘出来、呈现甚至突出强调，以供公众进一步认识风险与危机，唤醒社会的风险意识与警戒心。为了保证风险信息的准确传达，媒体需要借助一些画面来激发大众对风险的认知。这类符号或者画面，可被称为“风险之眼”，也叫“风险的文化之眼”（郭小平，2013:50）。比如大众传媒借助影像把儿童塑造成“天使”、“受害者”、“机会性靶子”等多重角色，来发挥其在风险报道中“文化之眼”的作用，并借此进一步加剧大众的风险感知。

作为风险的“文化之眼”，就是发现大众所忽视的、未知的、模糊的内容并将其有效传达，以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凝聚社会的风险意识。此时借助儿童影像可以使很多孕而未发的风险问题快速呈现并引发关注。如肥胖带来的健康隐患一直是潜在的风险问题，以此类问题为报道对象的新闻中常借助儿童影像进行传播。儿童群体容易出现的成长抑郁、心理健康、身体发展等问题在被影像化后更能引起受众的关注，让大家意识到肥胖问题的严重性。

作为风险的文化之眼，儿童影像与健康问题的交集最为繁多，如核辐射、材料污染、吸烟等议题的新闻常借助儿童这个脆弱的主体来启发受众的风险意识。在儿童的吸烟影像中，以比利时摄影师詹森拍摄的“Smoking Kids”影响最大（见图1）。印尼男孩每天要抽两包烟的新闻报道使其为之一震，其从而拍摄了以儿童吸烟为主题的系列照片。照片中吸烟的儿童神色各异，引人深思，表现吸烟危害的角度众多。詹森将儿童纳入严肃社会议题的摄影实践这一行为，直接引发了新闻界与社会大众的争议，在争议中，吸烟的危害性问题被多次放大，明显提升了社会大众对吸烟的关注度。



图1：吸烟的儿童
（Frieke Janssen 2012年摄）



图2：希望工程的“大眼睛”
（解海龙 1991年摄）

此外借助儿童影像，可以把复杂的社会问题加以剖析并呈现，唤醒被掩盖的事实与危机，帮助人们消解不确定的风险符号。如“希望工程”开展前期，人们对于西部山区贫困的认知太过于抽象，直到“大眼睛女孩”照片的出现（见图2），小女孩那双干净清澈又充满渴望的眼睛呼唤着人们的善意与行动，让人们把对“希望工程”的抽象认知转化具象感受，西部山区的贫困问题也因此成为公众话题的热议点之一。

（二）唤起大众的情感共识

媒体报道角度和表现方式的不同可以直接带动风险传播效果的放大。更大程度

追求感性刺激的图像加之儿童这一弱势群体定位,使儿童影像成为风险社会的有力载体,充分激发了大众的情感共识,增强风险认知。儿童凝聚着普世价值,具备跨时代、国籍、地区的情感内涵,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儿童被建构为纯洁的象征。西方文化中儿童的天使形象以及中国文化中对儿童的“童心”、“天真无邪”的赞美,都是基于对儿童的“纯洁性”的想象与向往。其次,成年人与儿童之间有着天然的关联。所有的成年人都曾经是孩子,儿童世界是成年人心灵的故乡。此外,儿童是有赖于成年人哺育、培养的生命体和社会成员。对儿童的关怀和保护被视为所有成年人的天职。再次,儿童作为人类生命延续愿望的承载体,是人们爱情的对象物,也是人类生命力和未来希望的象征(陈映芳,2003:5)。

基于人们对于儿童的这种认知,关乎战争、灾难的儿童受难图就成为媒体报道风险社会的首选角度。早年一张《智子入浴》(见图3)成为《水俣》专题中传播范围最广的一张照片。面对满怀爱意的智子母亲为残疾的女儿洗澡时的画面,新闻摄影大师尤金·史密斯双眼噙满泪水,按下快门,本应健康成长的孩子面临着中毒畸形的危害,孩子的痛苦、母爱的无助引发了大众的热议与反思,所体现出的悲悯情怀成为人们感情的集聚点。同样,当看到把摄影机当作手枪的叙利亚跪地投降小女孩时(见图4),人们关于儿童天真、快乐的记忆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跨越国界的同情与对于战争、灾难的愤怒力量,此图片被社交媒体疯狂转发并被网友加上“我其实在哭泣”、“难以置信的悲伤”等标题。媒体正在将大肆渲染的风险报道汇集成信息的瀑布,持续冲击着公众的头脑,面对着众说纷纭的现状,儿童影像以其独有的表现力一次次引发人们的普遍同情与保护欲,成为形成情感共识的较大动力。



图3: 智子入浴
(尤金·史密斯1972年摄)



图4: 投降的小女孩
(奥斯曼·萨厄尔2014年摄)

(三) 批评场域的强化效果

批评场域的建构是指:媒介通过揭露具体存在的风险,使社会大众认知到“风

险或问题确实存在着”，并对风险社会的“集体不负责任”提出严厉批评这一过程。当批评场域形成后，人们对于风险话题的议论随之攀升，由于儿童具有一定的政策导向性与情感寄托性，在批评场域中儿童影像传播带来的情绪波动与社会回应会激发风险事件的涟漪效应——这是促成风险放大的主要动因。美国学者凯瑟琳·卡普肖在其著作《民权童年》中曾指出儿童影像具有发掘及调和舆论、阻碍多元文化主义兴起的社会功效（Capshaw, 2014）。充分利用儿童影像，可以帮助呈现和解决风险问题，从而发挥儿童在明晰责任、寄托情感、引发热议中的作用，有效推动风险争议的沟通，促成相关实践与政策的落实。

风险具有社会镶嵌性，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中，借助儿童影像呈现问题可以产生更轰动的社会效果。在相关问题的探讨和关注中，社会各界的反应和舆论走向作为风险放大中次级效应的产物，会直接加剧大众的情感波动，增强风险感知，助推相关议题实现突破、走向高潮。2015年9月2日，年仅3岁的叙利亚小难民艾兰·库尔迪在偷渡的过程中溺亡的照片在各大媒体平台疯转（见图5）。一时间舆论纷纷转向谴责各国政府此前对难民问题的消极应对，最终不仅各国政府纷纷表态将积极援助，欧洲议会也于17日紧急投票通过由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项12万难民转移安置计划（袁丁，2015）。艾兰之死使得积聚已久的难民问题得以爆发，政策回应作为次级效应的产物直接增强了难民问题的社会热度，带动相关话题强势登上国际舞台。同样，1937年10月4日，一张名为《中国娃娃》的照片登上美国《生活》杂志封面（见图6）。照片反映了日军1937年轰炸上海南站的情形。画面中，一个满身鲜血的幼儿坐在铁轨上惶恐地大哭，日本对中国平民发动无差别轰炸的野蛮行径震惊国际社会。这张照片有力地影响了当时的美国舆论，国际社会反响强烈，对日军暴行的舆论谴责助推中日之战快速进入白热化时期。



图5：艾兰之死
（尼路弗·德米尔 2015年摄）



图6：中国娃娃
（王小亭 1937年摄）

（四）风险影像的集体记忆

持久的心理认同和态度是风险次级效应的重要表现方面。当一个事件定格成一个记忆点后，其带来的风险体验是持久的。情感波动、心理冲击易在集体记忆中被触发，从而增强个体的风险感知。儿童影像可以消解文字的抽象性和规定性，其隐喻的概念也延伸为非语言的能指，进而会产生出超越图像本身的多义性，带来超越地域、文化、政治界限的传播效果。近几年，研究媒介在集体塑造中的作用成为传播学的重要分支，集体记忆研究更加重视以媒介为桥梁下的动态过程（陈振华，2016），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儿童影像传播带来的集体记忆成为风险放大的主要方式。集体记忆理论提出：媒体是塑造社会认同的重要力量，当代风险社会，媒介在集体记忆的保存、传播中居于中心地位，并且在很多悲剧性事件中，记忆往往会更加偏向于弱者（Halbwachs，1992）。哈维·佩斯金提出“记忆都会为穷人和弱者说话”（Peskin，2000），更印证了这一观点。儿童是典型的弱势群体，易引发大众的关注和保护，自然也成为媒体建构集体记忆时的重要手段，利用儿童影像画面建构的风险环境更容易促成社会的记忆认同，达成集体记忆的长久互动性和影响力。

因具备较强的形塑集体记忆的作用，儿童形象在新闻摄影师们面前备受青睐，当面临风险事件时，摄影师喜欢把镜头对准儿童，用儿童影像的视觉张力与象征性强化人们对事件的感知和认识。2015年末公布的美联社年度图片精选中有不少以儿童为表现主体的照片，《TIME》年度精选图片中儿童图像所占的比重更是接近20%，如逃离的非洲小难民、被化学武器摧残的越南畸形儿、在空袭中受伤的叙利亚小女孩（见图7）……这些瘦骨嶙峋、充满恐惧的小面孔一次次深化人们对于现实的风险估测，增强着灾难性或创伤事件的后大众记忆。此外借助儿童影像凝固而成的集体记忆符号具备持久的感染力：一名小女孩在遭遇凝固汽油弹袭击后背部燃烧、赤身裸体奔跑的照片（见图8），在越南战争结束整整40年后，依然是人们对这场战争印象最深刻的画面之一。画面中裸体痛苦奔跑的女孩给人们极大的视觉冲击力和心理反差，从而成为越南战争中最令人不忍的回忆。



图7：空难中受伤的叙利亚女孩
（2015《TIME》年度精选图片）



图8：越南战争中的女孩
（黄功吾 1972年摄）

三、儿童影像的风险放大方式

（一）再现风险：具象化与锚定功能

风险放大的第一步是对风险事件的阐释，如何将隐匿的风险具象化呈现出来，将会直接影响各放大站的关系与公众感知。新闻报道的揭露、强调、浓缩与具象化的功能可以使得“看不清”的风险变得可见可感，媒介的锚定机制就是这种揭露、强调、浓缩与具象化的主要手段。风险放大的根源在于风险的社会体验，这包括直接的个人体验和间接的次级体验，当直接的个人体验缺失或极少时，媒体报道便成为社会风险建构的重要部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风险无法被直接感知，媒体“再现”就扮演了一种发挥建构作用的角色。图像因具备超越语言的表现力，能较大程度刺激公众感知，成为再现风险的有效方式。德国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从本质上来看，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成图像了。”（马丁·海德格尔，1997:86）。可见在这一视觉传播时代，图像成为媒介风险表征的主要方式，风险记忆与画面的叠加便呈现为一种视觉的狂热和景象的堆积。

借助这种“锚定”机制，影像表征促使人们关注并思考风险及其背后的问题。媒体、文化、受众等各放大站相互作用，受众感知也随着信息的多样化解读变得更为深刻。在风险放大效果的作用下，儿童影像并不仅仅是显而可见的儿童视觉形象，更包含围绕这些儿童形象而产生的各种关系的运作机制，通过儿童的图像或视频可以具象化其背后隐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Ranciere,2007）。正如《图像中的孩子》中提到的，在我们认知的图像中，儿童或是欲望对象物，或是政治、文化、宗教、灾难等的符号，或是国民情人……却唯独不是孩子自己（陈映芳，2003:34）。用儿童的身躯体现战争的残酷，用流离失所体现难民的痛苦，用瘦骨嶙峋呼吁人们的保护……通过儿童这个脆弱的主体把许多社会问题具象化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种借助儿童影像呈现风险的典型化表现方式让大众对风险的感知更为真切，儿童及其图像一直以来都是阐释风险的重要方式，一种带动风险放大的有效形式。

（二）话语争夺：儿童影像的议程建构

对信息流的理解和反应形成了风险社会放大的第二个主要阶段，媒体的论述方式与论述角度都会直接影响大众对议程的认知，因此围绕风险的话语争夺便成为风险次级效应的重要内容。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争议性和隐匿性，风险的社会建构是一种由各方势力与利益关系人彼此竞争的过程，是一种“开放性的社会建构”（顾忠华，1999）。此时媒介通过再现、遮蔽、凸显、创造等手法，把过去和现实联结在一起，把媒体与政治连接在一起，改变着议程设置的路径。在这个记忆碎片化、政治多元

化的时代,政治利益关系人可以利用对大众媒介更强的控制力,发挥儿童影像的巨大感染力,从而助推民族的形成和记忆的共享。在视觉文化时代,公共议题的建构常常诉诸于图像化的表征途径和方式,在底层话语所征用的批判性修辞实践中,“图像政治”是一种最常见的社会动员方式。又因一切政治行为和社会实践都热衷于以“纯真儿童”来许诺未来的美好计划(Edelman, 2005:3),大众媒介喜欢借助儿童影像来建构“问题”和“争议”,从而将政治话语争夺推向公共商议空间。

议程建构方式的不同直接影响着受众对风险信息理解与反应,关于儿童话语权的争夺随之成为风险放大的重要内容。媒介议程建构,一方面体现为争夺风险的优先论述权。风险斗争的关键表现为社会对风险的反应程度,越容易引起社会关注与反应的形式越受到媒体的青睐。此时传媒对风险的视觉化或者影像呈现,往往会成为意识形态建构与权力操纵的场域。儿童影像作为媒体的一种视觉建构,是一种典型的再现政治。以儿童影像作为叙述手段的媒体,充分发挥图片的说服和动员功能,把社会弱势群体或者边缘群体的立场作为主要的拍摄框架从而争取风险议题的话语权,把媒体议程变为公众议程。在关于非洲战争与难民的报道中,“孩子受难图”成为媒体的主要表现形式,孩子的无辜天真与残暴困苦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其直接强化了儿童这一弱势群体在风险社会中的“社会能见度”,并以儿童为导火索引发大众对非洲困境的同情,通过这种方式直接把风险强化定义成一个不可或缺的媒体热点话题。

媒体借用儿童争夺话语权的另一种方式体现为对风险议题的“他者”形象建构。探究媒体在风险中的议程设置,其焦点在于新闻文本中掌握支配权的“自我”与被支配的“他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只有拥有了支配的权利,才能拥有话语权或媒介的文本空间,巩固自我与他者的边界。媒介对“他者”再现的策略即将他者符号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着对一些特定符号的选择与组合,图像化选择就是“他者”形象塑造的重要方式(倪炎元, 1999)。作为一种文化隐喻机制,媒体对风险的报道通过“他者”的形象建构,体现了风险再现与风险论述背后权利关系的实践。如也门战乱中,国外媒体中儿童的流离失所成为大众的关注重点,此时我国媒体最流传的照片则是中国海军姐姐牵着一个妹妹准备登上归国军舰的照片,同样来自于战乱背景,女孩脸上的满足与喜悦同其他孩子形成鲜明对比。媒体把国外体现风险的儿童影像作为一个“他者”来呈现,以此把那些身处战争、灾难、疾病中的儿童异质化,从而呼求社会大众的认可,巩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三) 政治博弈:被操纵的砝码

政治与社会压力是风险次级效应的重要内容,当话题被赋予特定的政治背景后,其产生的传播后果会更加严肃、更为深远。被赋予政治色彩的儿童在传播中具备了明显的附加价值,媒体宣传与受众反应的互动过程促使其产生超越本身的放大效果。很多时候,政府为了进行社会控制,会借助媒体进行风险建构,当风险建构屈于特定的政治目的时,就具有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在风险传播过程中,因视觉图像具有塑造国家形象、打造政党政治平台、营造国际政治交流空间,强化国家政治观念等重要作用,各个国家、地区以及政府团体组织等经常通过视觉图像来传播社会上的焦点问题以及宣传当时国家政府的主要意识。有趣的是,“纯真儿童”常常成为政治家承诺美好未来的万能“押金”,是政治风险博弈中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Edelman, 2005:3)。

尽管儿童很少具备政治公民身份,遍布世界的各式政治宣传画所呈现的儿童影像却延伸出视觉化的论点:儿童其实是“政治主体”,发挥着很大的政治效用,儿童影像本身是为了促使成年人产生行动而被使用的(Dubinsky, 2012)。也正是因为“孩子”的概念是政治和社会的产物,它非常容易被当作政治动员和商业推广的工具。这些作为影像的儿童吸收、经历、再现由成年人操纵的政治议题,在风险激荡的环境中,发挥着稳定人心的政治效用。一战的海报突出以情感诉求打动人心的传播效果,利用妇女和儿童的情感表现力,减轻人们对战争的恐惧。战乱期间的海报《Women of Britain say - "GO!"》得到媒体的广泛宣传。在这款战时公债海报中,一位母亲形象的妇女位于海报中心,儿子扯着母亲的衣角眼望窗外,背景是美军在战争中激斗的场面,她的身后飘扬着巨大的美国国旗,国旗上是醒目的标语“妇女!帮助美国的儿子们赢得战争”(杨先艺,朱河,2013)。这则海报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其融入了女性与儿童的主题,发出帮助孩子的呼声,利用儿童形象在政治博弈中的较大说服力,建构起了成人世界对于和平的政治想象图景(Stephens, 1997)。

儿童影像的附加社会价值对“亚政治”具有一种重塑力量,“亚政治”状态常常体现为一种“媒体政治”,即把政治的博弈融入媒体的宣传中,将儿童相关信号放大,用来潜移默化的传播理念、思想,把儿童幻化为政治博弈中的利益关系场,从而实现得儿童者得人心的目的。叙利亚内战被视为第一场由社交媒体全面主导的战争,其真实的将政治博弈转换成一场高下立现的“媒体战”(史安斌,盛阳,2016)。2013年8月,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郊发生了一起化学武器袭击事件,造成上千平民身亡。网络上随后流传了一系列视频和照片。其中一个视频为摄像镜头对准了一排排儿童的尸体,他们双目紧闭,颜色蜡黄,由白布半遮半掩,旁边一名男子怒吼,宣称他们遭遇了化学武器袭击,极富冲击力的画面引起了政府和反对派

双方的争议。借助媒体对儿童影像的传播,叙利亚政府反对派找到了具有攻击力的立脚点,从而把媒体的影像传播与舆论导向转换为一种政治行为。

(四) 道德关怀: 风险影像中的人文主义温情

媒体的风险放大框架包含着“增强”与“弱化”风险的双重含义,媒体的报道方式和角度会直接影响受众的风险感知与风险行为。展现风险传播中的人文主义一方面可以增强大众对道德缺失的厌恶,同时也可以借助温情力量来缓解大众的风险恐慌。当下风险社会中存有严重的信任危机,大众传媒为说服公众,重建信任,必须借助道德诉求。同时随着风险环境越来越复杂,道德标准也呈现出一种乱象,对错没有明确的界限。此时作为传播中的共通性符号和普世素材,儿童影像解决了文化差异对沟通的阻隔问题,具有较大的道德诉求与艺术感染力,成为媒体增强或弱化风险信息的主要途径。

儿童影像帮助大众树立了明确的风险批判对象,可以有效凝结社会共识,达成风险批判,产生持久的风险冲击力。当社会中有危难与不公现象发生时,人们习惯于将带有“儿童形象”的影像捧出来激发人们的道德义愤,柔弱的儿童形象几乎成为表现人类深重灾难和深刻危机的最具代表性的形象符号。这种处于危难中的儿童影像一经传播,“救救孩子”便成了这个社会最能打动人们恻隐之心的呼叫,与其说这是摄影师们人为的选择,不如说是社会对于这一形象的高度认可。也正因如此那些伤害儿童的行径被看作最恶劣的道德犯罪,被全球社会千夫所指。在关于恐怖组织IS的报道中,我们就发现了不少儿童的身影。被训练使用手枪的娃娃兵(见图9),被用来装炮弹的玩具娃娃、并看到了儿童持枪处决人质的画面。无论是武器还是杀戮,这都与儿童本身的天真烂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儿童的本性被改变,最先触碰的就是受众心中的道德底线。因此在众多对ISIS组织的指责声中,以伤害儿童为主要攻击力的说法会迅速得到社会的认可,在媒体上广泛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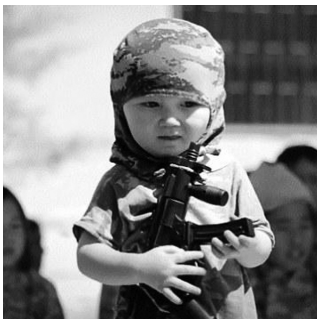


图9: IS训练的娃娃兵
(来于2014年伊斯兰国的宣传视频)



图10: 海洋中偷渡的父与子
(图片来自网络)

当风险环境加剧时,为了稳定受众情绪,“弱化”风险符号也是媒体的一种报道手法,此时借助儿童影像的传播可以体现出大众媒体的道德姿态。随着风险的纵深和交叉发展,大量的信息洪流一定程度上渲染了社会情绪、制造了恐慌舆论,流血、灾难、眼泪等许多的负面性词汇占据了媒介报道的大量篇幅。在这种对比下风险报道背后的温情更容易融化人心,彰显媒介的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儿童本身是一个弱势群体,在传播过程中尚无能力自我代言,更不懂如何发声,媒体聚焦在儿童身上,体现出对于这一失声群体的关怀,把儿童的心声通过媒体的视角呈现出来。没有媒体的传播,我们无法看到贫困山区儿童的渴望,也无法将触角伸及到众多灾难现场的孩子身旁。在风险传播系统中,多数受众处于不在场状态,将困境中的弱小群体画面传送到大众面前,让受众借助媒体实现援助,彰显了风险传播中的媒介责任。同时,在众多的儿童风险影像中,儿童除了作为图片中的单一聚焦点外,还会特别以被置于成人的保护与关怀中的形式突显出来。如巴黎暴恐袭击中,在慌乱的逃散人群中,我们仍能看到父亲不顾一切守护孩子的画面;在埃博拉病毒入侵时,医生呵护孩子的场景;在难民偷渡海洋的过程中,孩子熟睡在爸爸怀里的时刻(见图10)……这些影像有效抑制风险传播的扩大,展现着危机中的温情与正能量。

四、儿童影像放大效果的反思

儿童影像因具备较强的感染力与传播渗透力,在放大风险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适当的放大风险有利于提升大众对风险的认知,加强风险记忆,从而有助于防范与控制风险。但过度利用或错误利用儿童影像则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传播效果,儿童影像在风险建构的过程中存在以下三种较为常见的传播误区:

一是儿童成为被绑架的风险代理人。在关于风险问题的争论过程中,儿童与童年是一个被各方力量争夺的重要场域。当代影像中所呈现出的儿童形象数量多且类型丰富,但是他们都具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儿童形象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象征出现,具有奇特的面具意义,其本身有媒介式的社会效用。随着媒体报道角度的侧重点不同,儿童的附加价值被放大,本身意义在弱化,公众降低了对儿童的感知,增强对风险的认同。儿童影像在利用过程中会被媒体绑架传播,充当风险的代理人,表现为“风险中的儿童”与“作为风险的儿童”的差异性(Stephens, 1995:50)。在风险传播中借助儿童影像增强表达效果无可厚非,但是在很多时候,儿童影像被风险的定义者所绑架,成为了风险的替代者或代理人,成了为达到传播效果而制造

出的新风险。在风险传播中,媒介不仅简单复制信息,并不停修饰变换和自我生成,从而建构出新的风险,儿童影像此时就成为风险制造与放大的重要手段,其跨越国际的意义容易引发全球化的关注与追踪,从而带来造成更大规模、更深影响的风险漩涡。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众多的灾难新闻报道中,儿童的命运常常与地区冲突紧密绑定,而媒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则是故意强化儿童所经历的创伤和悲剧效果。在灾难性事件中,即便事件本身和儿童并无直接关联,大众媒体也往往借由儿童做注脚,从而使事件得以广泛传播并被公众所理解,有关儿童的灾难议题也因此具有了更长的持久性和更大的感染力。当冲突性危机事件中大众传媒习惯把儿童置于一种“在危机中”的状态,并表现为经历危机的终极对象(Moeller, 2002)时,儿童图片本身便成为了一种风险符号,造成一种儿童即风险的感知误区。

二是媒体对儿童情感的娱乐化消费明显。风险传播中的议程建构与媒体营造的舆论密不可分,但媒体有时过于满足受众的“原始需求”,通过对风险事件中的“悲情色彩”做倾向性阐发以赢得市场的青睐。关于政治思想的传播,也喜欢用夸大效用来追求轰动效果。在这种大肆追求宣传效应和娱乐化的时代,童年的影像正在成为当代消费文化在其不断追逐新变的旅途上为自己配制的又一帖兴奋的药剂。学者McKenzie Wark在论述媒体中受难儿童影像如何服务于政治和道德消费时,指出“消费儿童影像其实和伤害儿童一样属于平庸的卑劣”(Wark, 1995)。建立在儿童尤其是风险中的儿童上的情感消费直接触及社会的文化底线,引发大众的反感。当“艾兰之死”轰动国际社会,引发难民潮热议时,曾遇袭的法国杂志《查理周刊》刊登了两幅被网友认为是“恶搞”、“不敬”的关于艾兰之死的漫画。漫画一经发布,便引发了大众的愤怒之情,大众普遍反映,不能让儿童影像沦落成政治博弈与大众消费的情感宣泄物。儿童是单纯的群体,不应被成人世界荼毒,当政治博弈和公众话题开始夸大消费儿童影像之时,娱乐至死时代会走入更恶劣的发展方向。

三是某些媒体对儿童影像的呈现违背了新闻伦理。儿童影像采集和利用过程易引发关于伦理争议和新闻理念的反思。所谓新闻伦理是指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价值取向、道德表现与日常行为品德规范的总和,是新闻从业者必须恪守的专业道德,以及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社会通过媒体完成的风险建构是一个充满发展、充斥竞争的过程,媒体为了吸引受众的关注,形塑自身的媒介议程,渴望通过风险的放大框架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对儿童标签化处理、过度化呈现和虚假新闻等一系列新闻伦理问题:

(1) 标签化处理: 为达目的, 儿童经常被表现为“机会性靶子”、“新闻的噱头”, 只是一个与新闻中的根本性主题无关的卖点 (Moeller, 2002), 这种方式严重违背了新闻报道的道德准则, 使受众产生不合理的“风险想象”, 导致风险因素被放大。新闻从业者道德价值观往往会影响新闻媒介及其从业者在具体新闻传播活动中的行为和选择, 甚至影响到选择新闻的标准 (马艺, 张培, 2009)。如为了加强视觉呈现效果和新闻卖点, 匈牙利女记者曾故意绊倒经过其身旁抱着孩子的难民, 并用摄像机记录下孩子重重倒地时刻, 这种违背道德准则, 过度利用儿童影像的行为遭到了大众的质疑与反对。

(2) 过度化呈现: 关于儿童影像伦理之争中的另一个关键点是对报道中“尺度”的把握问题, 尺度争论更多源于对价值取向判断的多重思量。风险环境中的儿童照片往往具备较大的视觉冲击力, 将一些残忍的儿童画面摆在受众的面前, 在体现社会关怀的同时更多会刺激到公众情绪。与此同时, 照片的真实性问题、照片背后承载的意识形态分歧, 以及图片审美和情绪反应间平衡点的寻求等论证也未曾中断。当下儿童视觉影像的传播效力在日益增强, 如何拿捏好传播中的尺度不仅关乎报道技巧, 更关乎新闻伦理。儿童风险报道现仍然是媒体在主导议程设置, 把握不好呈现“度”, 不恰当或大规模大范围转发图片易引起新一轮的儿童伤害事件。因此风险传播中的媒体呈现更应该关注儿童本身的社会地位与话语权, 近几年, 非官方组织正在推动全球社会意识到儿童在冲突中的作用显现, 呼吁国际社会不要仅仅将儿童看做是一个合法的政治表演者和安全下的保护者, 应该给儿童或儿童机构更多关于风险的发声机会 (Burke, Lee-Koo & McDonald, 2016)。

(3) 虚假新闻: 某些媒体会把儿童图像置于无关儿童主体的风险内容报道中, 为了增加阅读量与点击量炮制虚假新闻, 违背了新闻从业者的日常品德规范。如1994年, 有关危地马拉“恐慌潮”的新闻故事与图片出现在媒体上, 全球主流媒体开始广泛报道偷盗儿童器官的故事, 这一捏造出的谣言借助全球媒体的报道大量繁殖并被赋予真实性, 给世界带来一系列新的风险。用一套符合新闻传播活动的专业化道德评判标准来规范新闻传播主体的行为已在业界成为共识, 相比之下, 儿童影像传播则需要一套更严谨的道德准则规范, 重建风险社会的传播伦理过程, 需要批判者有更多的智慧和勇气, 来完成对风险本身的超越 (全燕, 申凡, 2011)。试想当儿童影像不合理的利用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受众视野, 人们对儿童影像就会越来越麻木, 如果有一天社会对儿童也丧失了辨识度、注意力, 那将是另一种风险危机扩大的新开始。

五、中国视野下的儿童图景

儿童影像在风险建构的过程中发挥着自身独特的作用,由于不同国家媒体的传播语境不同,风险放大效果也各有差异。中国的媒体在报道儿童影像时的主导价值、报道方式和特点、话语模式选择等怎样影响我国范围内的风险传播效果是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卜玉梅,2009)。中国的新闻摄影随着政治背景的转变经历过不同的发展阶段,最后进入一个兼容并包的时期。正如顾铮在《一个自信国家的影像故事》一文中所评论的:“中国纪实摄影的发展是与中国社会的变化同步成长的”(顾铮,2004),不同的时代背景拓展着儿童纪录片的题材与角度,在画面语言与故事创作中寻求着突破(黎煜,2012)。相比国际视野,当下我国风险传播中的儿童影像具备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儿童影像中缺乏典型形象,难以产生触动人心的风险放大效果。当前传播语境呈现出质与量的双重缺失,一个是对儿童本身的关注度不够,相关影像作品数量缺乏;另一个是儿童影像中经典形象少,被大众铭记的作品有限。经典的风险传播中往往具备深刻的风险记忆点,儿童常会成为这个记忆点的首选对象。提及中国的儿童影像,大家都能反映出一些模糊的作品,如在《国家形象宣传片》、《舌尖上的中国》等经典纪录片系列中也不乏儿童的身影,关于贫困山区、留守儿童、免费午餐等系列的新闻报道也不在少数,但能被清晰记忆的作品是有限的。希望工程的“大眼睛”、汶川地震中的“可乐男孩”、“敬礼男孩”,这些风险传播中的儿童经典作品屈指可数。对比国外,基数小、经典少是我国儿童影像风险建构中困境,可见我国对儿童影像的风险传播价值认识不足,相关主题作品产量较低,很多经典作品不是源自于创作本身,更多来自于捕捉的偶然。创作者在选择儿童呈现问题的过程中缺乏独特的叙事手法,以至让人们对于儿童影像的风险认知呈现出千篇一律的倾向,难以造就触动人心的经典儿童影像作品。

二是关注“他人”世界,缺少自己的故事,儿童作为风险符号的价值被弱化,缺乏议程建构力。这一现象与我国当前共筑和谐社会的价值主导有一定关系。前文已经提及到,风险传播过程中存在一种“他者”形象的建构,通过把一些消极内容的载体他者化,从而巩固自身的意志。在风险传播系统中,对自身或者周边影像的记录与选择往往更具真实性和紧迫感,更能满足受众的风险认知与风险想象。如同样是贫困或留守儿童,对国外的报道因生活背景不同难以引发大众的情感共鸣,但身边的毕节儿童事件则容易引发大众的风险思考。目前我国在呈现风险问题的过程中尽管也可以看到一些儿童的身影,但在报道时媒体似乎更愿意把较大的传播力度

倾向于他人世界中儿童形象。在传播国外的风险世界时,儿童影像中的风险元素会被突出体现。如在表现非洲的难民情况时,一系列关于儿童难民的照片被媒体大篇幅呈现,长时间冲击人们的头脑,而转角国内报道,儿童影像中的风险元素往往被弱化或者忽视。如解海龙的希望工程系列照片中,只有一张“大眼睛”的照片被媒体广泛传播,系列相关作品则被弱化,“大眼睛”之后也再难出经典。讲好风险传播中的影像故事,应多反映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话语共同点、交汇点。影像纪录片等作为最具备国际化语言特征的表现形式,应该充分发挥其跨语言、跨民族、跨文明传播的优势,有效树立良好和正确的国家形象(赵曦,赵丹旻,2014)。目前中国儿童影像叙述在内容选材、创作理念和制作手法等层面仍然欠缺国际化视野,一味追求他人的风险故事会给自身造成更大的风险隐患,儿童影像在风险传播中独特的作用也难以发挥。

三是社会批判力量过重,缺乏对儿童本真的关注,表现为儿童被弱化,风险批判被强化,直接加剧了风险感知与受众想象之间的鸿沟。风险社会全面来袭,媒体在报道风险信息的同时,也需要拿捏好尺度,既要准确呈现出风险与危机,也要看到风险外的画面。当下我国儿童影像作品中的社会批判力量比较浓重,对儿童本位视角呈现的作品较少。观之我国儿童影像作品的选题,残疾智障儿童、留守儿童、贫困儿童、孤儿、流浪儿童的形象占据了国内儿童影像作品的大半个江山。一方面,媒体人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当下儿童存在的问题,藉以引起社会的重视;另一方面,少数媒体人为了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对儿童形象的选择过度边缘化、问题化。在创作过程中,用自身成人的视角剪裁和规范着自己心目中的儿童形象,以至于借助儿童影像呈现的风险传播出现一种病态化趋势,即把儿童这一弱势群体转变为问题群体。问题的体现可以强化风险传播的效果,但是过于主观意志化与成人化的视角呈现反而会掩盖儿童本身的说服力与震撼力,让人们产生一种麻木与抵制的心理,从而弱化风险感知。在众多的儿童影像中,张以庆的纪录片《舟舟的世界》等作品为我们打开了观看儿童世界的一扇大门,创作过程中对儿童本体理念的追求与呈现让人们真实感受到了儿童的世界。同样河南艾滋病村的报道中,作为志愿者的大学李丹走进艾滋病村的儿童,用本真的视角拍摄和记录下孩子们的敏感世界,产生了让社会动容的传播效果。风险传播中的儿童影像不应该被异质化与问题化,过重的批判色彩会使传播效果适得其反,我国对儿童独立人格的发现晚于西方,对儿童作品的塑造仍不完善,这就要求我国的影像记录者能够融入自己的认知和思辨,从而超越题材本身,从关注儿童生存到儿童的生活,以儿童视角关注与反

映风险。

六、结语

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是一个媒介与社会、与受众互动的过程,“真实”风险和“失真”风险不存在绝对的界限,影响风险性质和其重要程度的显著因素是构成风险社会放大的信息系统和公众反应系统。在各个风险放大站中,媒体对公众的风险感知有重要影响,作为风险信息的动态解释者和调和者,媒体的报道方式和角度直接影响了受众感知与风险传播效果。儿童影像具备较强的风险表现力和较多的附加社会价值,成为媒体呈现与增强风险传播效果的重要途径。借助信息符号的多样化、报道角度的强化,儿童影像在增强风险传播效果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效用。但过度放大风险会直接加剧社会恐慌,增强风险信息控制难度,因此媒体在利用儿童影像达成风险放大效果时需要更理智的传播态度,准确把握好儿童与风险的尺度、控制娱乐化消费、减少错误与夸大报道。当前我国风险传播领域对儿童影像的利用存有诸多问题,如何发挥其风险放大功效,达成合理的风险传播效果还有待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责任编辑:陈曦)

引用文献 [Reference]

- 卜玉梅(2009).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与经验研究及启示.《学习与实践》,(2),120-125.
[Bu, Yumei(2009).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Framework and empirical research and enlightenment. *Study and Practice*, (2),120-125.]
- 常硕峰,伍麟(2013).风险的社会放大:特征、危害及规避措施.《学术交流》,(12),241-245.
[Chang, ShuoFeng & Wu, Lin(2013).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Characteristics, hazard and circumvention measures. *Academic Communication*, (12),241-245.]
- 陈映芳(2003).《图像中的孩子》.山东:山东画报出版社.
[Chen, Yingfang (2003). *Image of children*. Jinan: Shandong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 陈振华(2016).集体记忆研究的传播学取向.《国际新闻界》,(4),109-126.
[Chen, Zhenhua(2016).Collective memory: Toward a communication orient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4),109-126.]
- 顾铮(2004).《世纪转身:中国社会变迁的视觉记忆》.北京:华夏出版社.
[Gu, Zheng (2004). *A review of the century: Visual memories of social changes in China*.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 顾忠华(1999).风险、社会与伦理.《台湾政治大学哲学学报》,5,10-25.
[Gu, Zhonghua(1999).Risk, society and ethics. *Journal of Taiwan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510-25.]

郭小平(2013).《风险社会的媒体传播研究: 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北京:学习出版社.

[Guo, Xiaoping (2013). *The study on media communication of risk society: A social constructivism perspective*. Beijing: Xuexi Publishing House.]

黎煜(2012).中国儿童影像纪录片考察.《现代传播》,(9),84-90.

[Li, Yu(2012).An investigation of Chinese child image documentary. *Modern Communication*, (9),84-90.]

马艺,张培(2009).多重价值的融合与冲突.《新闻与传播研究》,16(2),94-102.

[Ma, Yi & Zhang, Pei(2009).Amalgamation and conflictThe fusion of multiple value and conflict: The origin of the anomie of journalistic ethics.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16(2),94-102.]

毛明芳(2010).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机制: 以转基因技术为例.《未来与发展》,(11),50.

[Mao, Mingfang(2010).The Social magnification mechanism of technological risks: Taking transgenic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Future and Development*, (11),50.]

倪炎元(1999).再现的政治: 解读媒介对他者负面建构的策略.《新闻学研究》,(58),85-111.

[Ni, Yanyuan(1999).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s: Negative constructions of the other in the popular press.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58),85-111.]

全燕(2013).《基于风险社会放大框架的大众媒介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武汉.

[Quan, Yan (2013). *Mass media research based on risk social amplification framework*.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octor's Degree Dissertation. Wuhan]

全燕,申凡(2011).媒介化生存下“风险社会”的重构与反思.《国际新闻界》,(8),63-67.

[Quan, Yan & Shen, Fan(2011).Restructuring and rethinking of the "risk society" under media.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8),63-67.]

史安斌,盛阳(2016).叙利亚危机: 社交媒体“导演”的战争.《青年记者》,(1),76-77.

[Shi, Anbin & Sheng, Yang(2016).The Syrian crisis: A war “directed” by social media. *Youth Journalist*, (1),76-77.]

伍麟,王磊(2013).风险缘何被放大? ——国外“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与实证研究新进展.《学术交流》,(1),33.

[Wu, Lin & Wang, Lei(2013).Why risk is magnified? - New developments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y on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framework". *Academic Exchange*, (1),33.]

杨先艺,朱河(2013).设计史中视觉图像的政治力量传播.《艺术百家》,(4),137-144, 78.

[Yang, Xianyi & Zhu, He(2013).Political power transmission of visual image in design history. *Hundred Schools in Arts*, (4),137-144, 78.]

袁丁(2015).模糊的难民面孔: 来自欧洲的近距离观察.《文化纵横》,(6),34-43.

[Yuan, Ding(2015).Blurred faces of refugees: Close observation from Europe. *Beijing Cultural Review*, (6),34-43.]

- 曾繁旭,戴佳,王宇琦(2015).技术风险 VS 感知风险:传播过程与风险社会放大.《现代传播》,(3),34-43.
- [Zeng, Fanxu, Dai, Jia & Wang, Yuqi(2015).Technical risk VS perceived risk: Communication process and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Modern Communication*, (3),34-43.]
- 张乐,童星(2008).加强与衰减:风险的社会放大机制探析——以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为例.《人文杂志》,(5),178-182.
- [Zhang, Le & Tong, Xing(2008).Strengthen and decrease: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 A case study of "Fuyang Poor Quality Milk Powder Incident" in Anhui province.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5),178-182.]
- 赵曦,赵丹旻(2014).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的现实路径.《现代传播》,(1),90-94.
- [Zhao, Xi & Zhao, Danyang(2014).A realistic approach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documentaries. *Modern Communication*, (1),90-94.]
- 马丁·海德格尔(1997).《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50).
- [Heidegger, M. (1997). *Holzwege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Oringinal work published 1950).]
- 乌尔里希·贝克(2004).《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原著出版于1999).
- [Beck, U. (2004). *World risk society (Trans.)*.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Oringinal work published 1999).]
- Brant, S. & Cullman, Elissa (1980).*Small folk: A celebration of childhood in America*. New York: E.P. Dutton in associate with the Museum of American Folk Art.
- Breakwell, G. M. & Barnett, J. (2003).*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nd the layering meth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rke, A., Lee-Koo, K. & McDonald, M. (2016).An ethics of global security. *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1 (1), 64-79.
- Capshaw, K. (2014).*Civil rights childhood: Picturing liberation in American photobook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Dubinsky, K. (2012).Children, ideology, and iconography: How babies rule the world.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and Youth*, 5 (1), 5-13.
- Edelman, L. (2005).*No future: Queer theory and the death driv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Halbwachs, M. (1992).*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igonnet, A. (1998).*Pictures of innocence: The history and crisis of ideal childhood*.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 Hill, A. (2001).Media risks: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nd the media violence debate.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4 (3), 209-225.
- Holland, P. (2004).*Picturing childhood: The myth of the child in popular imagery*. London: I.B.Tauris.

- Kasperson, R. E. et al. (1988).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 conceptual framework. *Risk Analysis*, 8 (2), 177-187.
- Leiss, W. (2003).Searching for the public policy relevance of the risk amplification framework. In N. F. Pidgeon, R. K. Kasperson & P. Slovic,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eller, S. D. (2002).A hierarchy of innocence: The media's use of children in the telling of international news.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7 (1), 36-56.
- Peskin, H. (2000).Memory and media: “cases” of rigoberta menchú and binjamin wilkomirski. *Society*, 38 (1), 39-46.
- Rancière, J. (2007).*The future of the imag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Rosa, E. A. (2003).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framework (SARF): Afera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In N. F. Pidgeon, R. K. Kasperson & P. Slovic,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ephens, S. (1995).*Children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tephens, S. (1997).Nationalism, nuclear policy and children in cold war America. *Childhood*, 4 (1), 103-123.
- Susarla, A. (2003).Plague and arsenic: Assignment of blame in the mass media and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and attenuation of risk. In N. Pidgeon & R. E. Kasperson,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rk, M. (1995).Fresh maimed babies. *Transition*, (65), 36-47.